

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

——兼论浙江一师文人精神气质的衍变

张直心

内容提要 沈玄庐、刘大白、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浙江一师文人的创作，见证了新文学初创期新诗的崛起与散文的中兴。耐人寻味的是，与其五四前后精神气质的沉潜衍变适成呼应，其文体亦大致呈现了一个从诗到散文的集体性取舍趋势。而朱自清发表于1923年的长诗《毁灭》恰似一座界碑，可借作彼时一师文人不约而同作别诗化青春、步入散文人生的宣言。“人”“文”相契，对于浙一师文人群而言，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急不徐、“前进而不激进”的生存姿态，一种智情合致的思想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藉此文体得以关注更其日常、宽广的人文经验，追求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形散神不散。

一 “火气”与“清气”的消长

在着手明清之际士人研究时，赵园特引王夫之所谓“戾气”一词为题，用以概括明代尤其是明末社会的别一种时代氛围。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所谓“戾气”，不止由统治者的暴虐，“也由‘争’之不已的士民所造成”^①。恰是对后者的批评向度，尤为可贵地蕴含了王夫之乃至识者赵园独具的士文化反省意识。

借重上述士文化反思，笔者拟以“火气”一词，指称民国初期、尤其是五四以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士人中充斥的某种激进情绪。此类“火气”诚然是彼时具体历史情景下的正当产物，满溢着青春期的锐气与激情；但也毋庸避讳，一定意义上，与“戾气”之成因相似，在与旧传统、旧文学相争相激之际，难免产生一些矫枉过正的负面症候。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而不无象征性地点燃这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火焰的，恰是后浙一师时期的重要领袖人物，与一师师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执掌春晖中学、创办立达学园的同道匡互生。史称时为北高师学生的他率先

打破铁窗，冲入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与卫兵格斗；他还取出火柴，将卧室的帐子拉下，放起火来……^②赵家楼的火焰，就此成为五四激进精神以及士人“火气”的鲜明表征。

与匡互生的一度侠烈火暴性格相类，浙一师校长经亨颐身上也充满了某种峻急躁进之气。少时他曾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遂遭通缉而亡命天涯；1927年南昌起义发动，他赫然名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册中；1930年又因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锐意反蒋，旋被“永远开除党籍”。

如果说，其左翼政治倾向犹值得称道；那么，那过于激进的文化立场却不得不引人反思：1928年，身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他提出了废除故宫，“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之议案^③。理由是“在中文里‘故’字有怀念的意味，这‘故宫’二字大有禾黍离离之感”，唯恐遗民藉此寄托对旧王朝兴灭更替的哀思。这一偏激主张与姿态同样不乏象征性。某种意义上，“故宫”远不止是封建帝制的载体，而适可视为闷约深美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架的隐喻。

其主持一师教育革新，最引人瞩目的应属倡导“学生自治”与推行白话文这两项举措。试行

“学生自治”，本意在于易“他律”为“自律”，然而五四一役之后，一师学生自治的权力日渐扩张，学生自治会代表得以出席校务会议，参予决策；甚至组织学生法庭，自行审理学生之间的积愤与思想纷争。至于推行白话文，蔡元培针对时人指责北京大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之说，曾辩及彼时北大预科国文教材“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④；而作为培养师资的一师，国文讲授却一度“旧的一概否定”，尽“改文言为白话”，国文“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大白还因章士钊持“文言雅洁说”而爆粗口，指斥“章大虫底放屁逻辑”^⑤，直到姜伯韩主校，方易为“教员视学生程度，得酌授文言”。

经亨颐倡导“与时俱进”方针，堪称时代先锋；但其唯恐难偿历史进程之时差，每每弃“渐进”而代之以“急进”、“猛进”步伐，则难免过犹不及。与经氏信奉唯“新”是趋的“时间神话”观念相类，俞平伯也曾刻意“舍旧谋新”。五四运动那年，他在《新潮》杂志发表《打破中国神怪思想之一主张》一文，力主“严禁阴历——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一事刻不容缓。因为，如此“便不会有干支，不会有干支的阴阳五行；不啻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么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烧香哪，祭神哪，种种荒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绝自绝”。年方十九的他未免行事过于焦躁激切，每每寻求所谓“最简截最痛快的办法”^⑥。这未尝不是“火气”旺盛的五四同人共有的倾向。即便一师前辈鲁迅，也一度相信“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⑦。更遑论学生辈中以一纸《非孝》檄文惊世骇俗、一度迷信“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的施存统^⑧；以及“风潮”平息多年犹火气未消，不惜背欺师灭祖之名，撰小说《校役老刘》以宣泄自己对母校一师怨愤之情的魏金枝。

曾几何时，以“一师风潮”为界标，前后一师士人风气渐变。缘于五四灰飞烟灭、“风潮”波澜不惊后，一师师生集体性的痛定“思痛”；缘于新进教师朱自清、叶圣陶毕竟天性平正和易，最终乃以和风细雨式的调适滋润，改变了“那时一师脱略的风气”^⑨；也缘于丰子恺及其老师李叔同静对万象万事、躁忿全消修养的感染；缘于浙一师——春晖中学——立达学园这一路辗转、时过

境迁后的柳暗花明。

后一师文人重新框定了其生活空间、工作空间以及审美空间，由前一师时期惯于振臂广场、操场、议会等宏大领域，衍变为栖身“湖畔”（西湖、白马湖）、“平屋”、乡村、书园等日常场景。天人互动，后者赐予了他们“美”、“自由”、“真诚”、“闲适”的境界与除尽火气见清气的氛围。

与“火气”适成对照的“清气”一词，典出1924年经老友夏丐尊介绍、加盟上虞春晖中学的朱光潜。他称：到白马湖后，结识了后来对其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与丰子恺几位好友，“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⑩。

如果说，“火气”喻示着某种激进主义的情绪；那么“清气”则意味着一种渐进主义、或谓“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精神气质的升华。身逢世变，此种火气渐消、回归本性的趋势便因此具有了历史的多维向度。其内蕴包括束己自爱，笃厚诚信，平和坦夷，宁静致远。显然不仅指涉政治姿态，亦关乎人生哲学、审美境界的追求。

在那一味激扬“火气”的时代，批评家曾据此针砭朱自清等的“清气”：“他是反抗黑暗和一切旧的不合理现象的，然而缺少在我们时代所不可少的所谓伟大的憎；他是向往和赞美青春的，但在他的作品上和性格上，革命的青春烈火就似乎被压着而没有旺盛地燃烧。”^⑪

相形之下，还是同时代人对其所具“清气”更含同情的了解。朱光潜、沈雁冰等分别指出了“清气”的维度及张力：朱自清“柔而不弱”、本性“不屈不挠”；叶圣陶“待人接物，谦和平易，质朴无华，看来很有些温柔敦厚气，但外柔内刚，方正鲠直，眼里容不得沙子”^⑫；人“常用‘清’、‘和’两个字来概括子恺的人品，但是他胸有城府，‘和而不流’”^⑬；“他们的政治观点，前进而不激进，沉实稳健而非锋芒毕露，不满现状又尚未构成尖锐的对立。对待事业与工作，一律认真负责”^⑭。显然，此种退而守成、和而不流的风神，恰可移作对彼时仍一味亟亟于功利、好刚使气、峻急躁进的时风的适度反拨。

二 诗化青春

与前述时代氛围、精神气质的沉潜衍变适成呼应,通观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前后一师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其文体选择亦大致呈现了一个从诗到散文的整体性趋势。

五四时代,无论是沈玄庐、刘大白,抑或是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及至学生辈的湖畔诗人群,都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诗这一青春文体抒发自己的情怀,宣泄身逢五四青春期那满溢着的时代幻想与激情。

由沈玄庐等主编、创刊于1919年6月的《星期评论》周刊,曾以大量篇幅支持新诗的尝试与探索,因而与《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齐名,被史家誉为“在白话新诗创业初期最值得纪念的刊物”^⑤;而由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筹划编辑,于1922年1月在一师这一母体中孕育而生的《诗》,则堪称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刊。此外,晨光社、湖畔诗社应属新诗史上最早的诗歌团体;沈玄庐的《十五娘》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⑥;朱自清的《毁灭》则被时人视作“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长诗^⑦。不言而喻,一师诗人为新诗的萌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如此引人瞩目,长时期以来多为文学史论著(包括笔者的一些著述)称道,故此处不再赘述;而其负面症候,却缘于往往为史家忽略不计似更值得探析。

一师学生魏金枝曾是“一师风潮”及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其30年后对“风潮”浮躁火暴之气的反省以及对新诗运动负面性的嘲讽(未尝不可读作“自嘲”),因此引起我们注意。他说:“在紧接‘五四’的这个时代里,原来可因说大话做新诗而起家的,甚至敢闹一切不正常的恋爱,也可以把自己弄得煊赫一进,即使不成为风云人物,也会被搬上话剧场,或者请去拍一套影片。譬如当时的刘大白、刘延陵诸先生,就是做新诗得名的,沈定一就是一个说大话出身的”,“总之,正当那时,一切泡沫,都可以冒充浪潮”^⑧。

如果说,以上讽刺较多地指向诗人的人品(含文化姿态);那么,郑敏在对新诗创作作世纪回眸时针对刘大白等的“双重诗格”,则显然

已兼及其诗品(含审美趣味)了。

郑敏分外看重刘大白诗《秋夜湖心独坐》的艺术魅力,却不认同其追求大众化风格的诗歌如《卖布谣》《割麦过荒》诸作,指出诗人“为穷人”呐喊,“其意可嘉,但诗则是多余的了”^⑨。郑敏纯诗的审美取向中,依稀透露出新诗百年发展史上日渐稀罕的某种贵族精神。诚然,郑敏亦有其审美偏嗜,平心而论,“平民化”抑或“贵族化”的审美需求都“应当尊重”;但问题的关键是,刘大白的此类诗出于功利性目的,不惜将平民化的形式追求强化到极端,俨然“文学斗士”,这才使郑敏的批评师出有名。

其实,较之刘大白,沈玄庐更好为“文学斗士”,在他所拟文学宣言《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诸文中,便如郑敏针砭的,惯于将新/旧文学视作一对“水火不容的对抗矛盾”,遵循“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⑩,号召青年人“杀进去”,“在这个战场上把旧东西扫除得干干净净”^⑪。

他与刘大白合力将白话诗题材开出新境。不仅史无前例地为农民运动树碑立传,还发表了大量为工人命运鼓与呼的诗作,在新诗史上自然功不可没。然而除《十五娘》等优秀之作外,一些作品刻意扩张诗歌启蒙民众、鼓动民众的功能;此外,抒情主体每每情绪过于冲动——借用其诗中的描写,所谓“烈火烧心、狂云拥背”,闷煞了“胸中的块垒”^⑫,以致一泻千里,一览无余。

五四以降四年,可谓玄庐诗歌创作的喷发期,共发表了百余首诗,均刊载于《星期评论》周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章上。缘于其鲜明的政治活动家倾向与动机,加之感染、兼顾了报馆文章的宣传性、即时性等因素,其诗适可谓醒世的宣言,觉民的警钟,控诉的血书,进军的战鼓。试读代表作《起劲》。抒情主人公为工人“起劲”做工,却仅仅只能“养活几个剥皮敲骨的富家翁”的境遇愤愤不平,起而疾呼:“切断工人颈子上的锁链,/打破资本家所建筑的牢笼。/什么是现实的文明?/把他来‘粉碎虚空’。/没有‘富’,/那来‘穷’。/没有‘私’,/那来‘公’。/腕力十分雄,/心花十分红。/‘起劲复起劲’,/从此不做国家人种的糊涂梦。”^⑬音韵读似铿锵,节奏急促有力,如咚咚鼓点,颇具鼓动性;却少了诗性蕴藉与回味。

不无悲剧意味的是，其诗歌创作中，多凸现政治活动家与斗士的身影，倾向未能自然而然地流露；而综览其政治生涯，却归根结蒂还是一名浪漫主义书生、一个诗人。前引魏金枝的讽刺，未尝不是歪打正着，切中了玄庐的某些局限。只是魏氏多少有以成败论英雄之嫌。若论玄庐“说大话出身”，其诗文中固然不难觅得“把大海搓圆，朝太空掷去，人在圆顶尖头立”，“把豪情拨起，驾上涛……忍着要发的世界新潮，正打点涨大全球”一类过甚其词、主体极度膨胀的豪言壮语；但藉此印证玄庐是如此“把自己弄得煊赫一进”，却未免大大低估了玄庐这一远非纸上谈兵的“风云人物”的传奇性。

玄庐出身地主，却率先在萧山衙前发起农民运动，不惜千金散尽；一介书生，却“也曾骑怒马抽刀杀敌”，壮怀激烈；他曾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然又妻妾成群，还一度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丁宝林热恋，而伊唯恐其“志气要消暮”竟削发为尼^⑧；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他多有开天辟地之创意，也不乏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沦落至脱党，却又依然执着进行农村自治实验，为此不惜血浴故乡……究其一生，可谓成亦诗人气质，败亦诗人气质！

去其偏颇，魏金枝的苛评之价值在于，它能启人反思：沈玄庐等好标新立异之创举中确渗有一些哗众取宠的习性，叱咤风云之际亦未免不时凌空蹈虚。这“诗人病”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五四时期一师诗人群程度不等却性质相似的症候。

无怪一师后学曹聚仁也曾以“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汪静之为例，剑指湖畔诗人——张维祺、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诸氏继之的“诗人病”：“五四运动前后的文艺青年，也可说是很幸运的，呼吸了一点时代的新空气，一个筋斗翻过来，很早得到一点小名声，成为文人或诗人”，但是“太容易的成功，就象一个肥皂泡子，飞在空中，看起来很美丽，一下子就会吹破了”。“所以浪漫的抒情诗人，就有一种命定的悲哀，老调子的热恋诗一唱完，就唱不下去了。”曹氏虽因惯于对一切问题采取批判态度，而素有“乌鸦文人”之戏称；但缘于此文采用回剑自戕、复剑贯对手的战法——“这话，实在是在说我自己，却也包

括静之兄在内”^⑨——便平添了几分力量。

耐人寻味的是，魏金枝、曹聚仁痛定思痛，反思五四时期一师诗人好于涛头弄潮，然而运动退潮后，终究落得是“浪潮”抑或“泡沫”混沌莫辨之际遇，却不约而同地记取彼时朱自清师那如中流砥柱般“坚实”的风姿。

作为后一师时期的灵魂人物之一，朱自清为人文确实相对平正稳健乃至达臻如魏、曹所看重的不憚“背时”的境界，故适为一师同道后学效以安魂；但置身这纷扰喧嚣的时代，也难免有些许随波逐流的“趋时”之举。例如他在为学生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作序时称：“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是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底文学。”尽管他何尝不知“前者固有与后者并存底价值”，二者原不能偏废；却还是认同“现势下”，前者应是“先务之急”的时调^⑩。

“血与泪”或谓“血与火”意象一时成为一师乃至诗歌界主流诗潮的主题与基调的象征。朱自清也撰有《血歌》《赠 A. S.》《送韩伯画往俄国》一类血脉贲张、火气升腾之作——“血是红的！/血是红的！/狂人在疾走，/太阳在发抖！/血是热的！/血是热的！/熔炉里的铁，/火山的崩裂！”^⑪——勉力以其如“血的歌”、“火的绘画”般的创作，应和那“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时代理想。在朱自清身上，狷者/狂者亦可说是其一体之两面。

恰逢青春期的朱自清诗作中充盈着的，除却“英雄之情”，更有“浪漫之情”。某晚泛舟湖上，见“一只插着小红花的游艇里，坐着八九个雪白的白衣的姑娘”飘然而过，惊为“暂现色相于人间”的天人。故不仅撰《女人》篇纪实^⑫；且复沓为之赋诗。如《湖上》赞美乘着那“舷边颤也颤的红花”小船，唱起美妙的“不容我们听，只容我们想的歌”的“白衣的平和女神们”^⑬。如果说前述“手象火把”、热血沸腾的盗火者 A. S.（原型即邓中夏）堪称“血与泪底文学”中的英雄典型；那么，湖上的白衣姑娘恰可借作专司“爱与美底文学”的女神。

无论是“英雄之情”，抑或“浪漫之情”，磅礴郁积既久，难免境至“极境”，情至“纵情”。如是便有杭州湖上三夜的畅游寻欢；便有曲折宛

延二百余行的长诗《毁灭》。

诗人一度尽享“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⑧，然而物极必反，临了还是“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于是，虽曾有浮沉于“浓香”、“腻味”、“滑泽”、“松软”间的靡靡然，终究思想不如归去，那诱人的“吹弹得破的面孔”，陡然间“只剩一张褐色的蜡型”；即便那“雪样的衣裙，/现已翩翩地散了，/仿佛清明日子烧剩的白的纸钱灰”；而“虽有巧妙的玄言，/像天花的纷坠；/展示渺渺如轻纱的憧憬”，也免不了被“下界的罡风”吹散……此处引人注目的是，“毁灭”的远不止于“迷恋恋恋的颓废生活”，还有那浪漫的白衣“女神”；破碎的亦不止是“五色云里的幻想”，更连同那“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的诗国梦境^⑨。

为了救正激情幻灭的后果，诗后一种“丢去玄言，专崇实际”的人生哲学于焉而生。适如俞平伯所阐释的：“他不求高远只爱平实；他不贵空想，只重行为；他承认无论怎样的伟大都只是一言一语一饮一食下工夫。现代的英雄是平凡的，不是超越的；现代的哲学是可实行的不是专去推理和空想的，他这种意想，是把颓废主义与实际主义合拢来，形成一种有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⑩如果说，所谓“颓废的刹那主义”，其形式其本质更近乎诗，终究令人怅惘空虚、茫无所依；那么，彼时朱自清所欲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或谓“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其精神格调已渐趋散文化的平实。

三 散文人生

发表于1923年的长诗《毁灭》恰是一座界碑，可借作20年代中期一师文人不约而同作别诗国青春、步入散文人生的集体性宣言。

1924年岁末，朱自清出版了诗与散文合集《踪迹》，四年后又出版了《背影》。与此适成呼应，叶圣陶与俞平伯也于1924年合出了散文选《剑鞘集》，此后又刊印了一部《脚步集》（1931）；1928年，俞平伯出版了散文集《杂拌儿》与《燕知草》；夏丏尊则将其写于春晖中学“平屋”里的散文随笔辑为《平屋杂文》，存其1921年至30年代的作品。至于学生辈中，丰子恺

最见后来居上之势。他于1925年始发表散文，六年后结集为《缘缘堂随笔》。及至“开明”时期，随着刘大白、陈望道等昔日同事的加盟，一师文人之散文创作更是极一时之盛。

如果说，前此沈玄庐等发表于《星期评论》报章上的那些文字也可归之于广义的散文，但那显系“新民体”，一意指点江山，改造社会，纵笔所至不检束，审美蕴藉不足；那么，有别于沈氏的政论式文体，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的文字已属于艺术散文，即“美文”。前者立意载道，后者偏重言志。

深究一师文人“从诗到散文”这一集体性文体取舍的原委，研究者多有援引朱自清1928年“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时的那段自况——“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缘于形式“随便”，或谓“懒惰”、“欲速”……^⑪却每每忽略了其低调之下更深沉的寄托。其实若真重视夫子自道，不妨参照朱氏1922、1923年间致俞平伯的《信三通》，此为其详加阐释秉持“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哲学的重要文书；以及写于1928年2月的《哪里走》，那是朱氏身逢“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有心疏离“时代的火焰或漩涡”的思想宣言^⑫。后者恰可支持周作人从“王纲解纽的时代”、郁达夫从“个人的发现”来求证现代散文中兴缘起的见解^⑬。

因着上述线索的提示，我们已大致能归纳一师文人之所以改弦易辙、寄情散文的部分动因：

首先，缘于五四潮起潮落之背景：初，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继而浪漫政治理想轰毁；及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波三折，一定程度上驱使一师文人厕身散文这一相对边缘、相对淡泊的文体，藉此“卸下‘载道’重任”，疏离政治的风暴眼；同时也逸出诗歌、小说结构形式的羁限，赢得可供个人自由言说的文体空间。

其次，诗神分外钟情青年人，即便五四时沈玄庐、刘大白已人届“而立”，心理年龄仍俨若“新青年”、“欧化老少年”；而散文则更多地属于“中年的艺术”。一师文人走过了五四“少年中国”、青春中国阶段，此时难免生出中年落寞之感。——周作人所谓“盛时过去”，前路艰难。尽管俞平伯一度“不希望他拿这些话来短少年诗人

底勇气”，然而自从域外西还，便亦平添了几分书生老去、诗兴阑珊的意绪。至于朱自清、叶圣陶及丰子恺，原本性格便少年老成，经此中年沉潜，更是滤净了诗人“那些过分的伤感”，“那些飞扬跋扈的气息”^⑤。

其三，若说诗的节奏与律动是跳跃、是歌是舞，那么“散文是散步”。某种意义上最能因应一师文人此时“前进而不激进”的政治姿态。既是“散步”，本“不一定需要目的地，随兴所至”，随遇而安；然而时代的扰攘却使其步履难能如此随意，在散文立意“闲适”、“性灵”抑或是“挣扎和战斗”的论辩两翼间，他们自觉非自觉地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借用《毁灭》及《信三通》里表征“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的形象与意境喻之：“不再仰眼看青天”，只谨慎着“一步步踏在泥土上”。“一步不急，一步不徐”，“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其间，固然不无彷徨、退隐，乃至左右失据，进退两难，但从那稳健踏实的足迹延伸着看，却分明可见上下求索之势。史家认为朱自清“这种中和主义和新诗有一种天然的隔膜，对诗情的滋长和爆发都有消极影响”^⑥；换言之，其为一师文人的散文书写乃至人生道路倒是不无默契。

此外，无论是执教春晖中学还是立达学园，思不出其位，所作拟想读者自然多半是身边的青少年学子；即便此后创办开明书店，所编主要刊物仍是《中学生》，出版的著述中最有特色的仍是中学、大学教材与课外读物，诸如《开明活页文选》《开明国文讲义》等，依然不脱师范遗风。而所以选择散文这一文体，一定程度上恰因其“适于传授写作技能，为学生学习写文章提供范文”^⑦，同时也宜于与受众促膝谈心，深入浅出。

识者称：散文“跟诗歌、戏剧、小说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文’与‘人’的关系更紧密些，不一定‘文如其人’，但文章与作者的人格、趣味、学养、生活经历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⑧。诚哉斯言！作为撑起30年代现代散文中兴重要一支的一师文人群，时人如郁达夫、钟敬文、阿英均一语中的指出其风格别具“清幽”这一共性。这自然应归因基于人格、趣味、学养等先在禀赋的生发，但亦不可忽视散文精神的后天陶养。

当彼时的“实际政治”情境不再能为一师文

人群的理想抱负提供寄托的所在，他们“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本业上^⑨，其所选择的散文这一载体便亦于自觉非自觉间转移为安身立命的别一艺术空间。藉此书写退而“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所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进而启蒙思想，灌溉新知。而散文文体特定的形式、节奏、格调，也不时于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书写者的性格修炼、感情沉淀乃至情智合致。一言以蔽之，散文养气。

如是“人”“文”互动，“人”“文”相契，便使以下从艺术风格层面探析其作品中诗性与散文性相斥相融诸现象时，犹能发现审美取向向下每每渗透着人格意味：

时人分外看重朱自清散文若置于“同时人的作品中，另有种真挚清幽的神态”^⑩。这是因着“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营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⑪。如是清水出芙蓉般的清新之气，可谓朱氏散文及其同人创作一个总体性的风格特征，由此便奠定了其堪称“美文”正宗的文学史地位。至于细部的文字、修辞、审美，史家大可见仁见智。郁达夫激赏曾是诗人的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并推测想来是在浙江的青山秀水间住久了的缘故^⑫；挚友叶圣陶却偏不看好其散文语言及情感层面的耽美、溢“诗”，称：“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儿做作，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⑬若单纯就审美个性而言，叶氏之针砭未免有些苛刻；然而，若联系前述浙一师文人从诗到散文整体性取舍这一大背景，联系个中“人”“文”相契的关系，便自然会会意：一味溢“诗”，不仅逾越了散文的形式规范，更有违艺术伦理，乃至人生哲学。恰恰缘于此，叶圣陶以及此后的评家均不约而同地珍视朱自清散文的中年变法，称道“近年来他的文字越见得周密妥帖，可又极其平淡质朴”^⑭；并归因其“年岁大了，经验多了，情感渐渐收敛，理智渐渐开拓，于是心平气和，平正通达，严肃而不冷峻，温和而不柔弱”^⑮。

无独有偶，与朱自清并称的俞平伯的散文风格彼时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衍变。俞氏可谓“日

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哲学的第二作者，也倡言“努力把捉这现在”，追求“生活刹那间的充实”^⑧；恰是赖有他与朱氏的反复切磋探讨，质诘辨证，“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方能渐次成形。

其早期散文适如史家所称“喜浓艳，对抒写的感情常常反复渲染”，这种特性应是“他刚从诗歌创作转向散文创作一种不适应的反应”^⑨；及至20年代中后期，才渐次洗尽铅华，摈弃“繁缛”，随其同道同归“素朴的趣味”^⑩。虽也因政治环境的恶劣，一度“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但内心深处终究不失“反抗”，言不尽意间，作品遂于感情的“明净”、智理的“清澈”中平添了几分涩涩的况味。

叶圣陶也躬身垂范“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哲学与“中和”美学境界。其《脚步集》顾名思义，即源自集中名篇《“双双的脚步”》；而后者之寓意又显然典出朱自清的《毁灭》——其诗曰“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循此题名，已依稀可见弥散于其散文集中的核心精神。在具体作品中，他坦言执着现时“正当而合理的生活态度”^⑪。

叶圣陶早期受一师同事朱自清、刘延陵等影响，也写过一些新诗，但大都过于平实；其长诗《浏河战场》更形似“散文分行”。相形之下，一师文人中，他的气质似乎最少诗性，故皈依散文这一艺术空间可谓深得其所。他那认真处世、平易实在的性格形诸笔下，每每“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感触”。因其风格谨严，多被史家视为：学生若“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⑫。他擅以含蓄节制的手法，调和情景物我，譬解感时愤世的块垒，以期不失“中和”之境。然而，唯其矜持，唯其节制，当那抑不住的苦闷、愁绪不经意地在字里行间洩出时，方显得如此深沉动人！如《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能否将“这种思乡情绪纳入当时大背景——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落潮中考察”自可斟酌^⑬；却能从作者竟然落寞得寄情于向隅而歌的“凄凄切切的秋虫”，足以会意扰攘时代一师文人那命定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乡愁。

一师文人群的散文都有一股“清气”，纵然时人细细品味，着意辨析，也至多能发见同中些微妙之差异。如称朱自清的散文为“清幽深秀”，

叶圣陶的“清淡隽永”，而其学生丰子恺的散文则被视作“清幽玄妙”^⑭。论及“玄妙”，史家多有追溯其师从李叔同的佛学渊源；甚至一叶障目只见其“躲避人生”、“飘然”世外^⑮，而忽视了玄妙与平实，逸世与入世，“漫”画“随”笔与苦学力行，恰是其一体之两面；究其一生，更多地还是“秉承老师‘认真’的作风”——除却李叔同纯任自然后的严谨，另有夏丐尊温和中的不失方正，乃至朱自清、叶圣陶自谦平凡一卒之人格“后光”的烛照。懂得这一点，即使于其富有宗教气息的作品如写于1925年的《渐》中，也依然能读出执着人生的意味。作者久久沉浸于世事无常、人生“渐”变的感怀里，临了却引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诗句作结——“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⑯。恰是因着骨子里的认真执拗，文中那不无消极意味的刹那主义，最终还是转化为“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有意思的是，自觉非自觉间，所引诗句不仅道出了其散文长于由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发现宏旨精义的艺术旨趣及手法；更遥相呼应了乃师朱自清与俞平伯那场由“颓废的刹那主义”进为“积极意味的刹那主义”的探讨，以及由此衍生的莫管“人生无常有常”，“小处下手”，把握住你心里的便是无限，如是每一刹那便生出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著名结论^⑰。

风格照映史观。很难辨明，究竟是浙一师文人群所执“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人生观念及方式，影响了其散文“审美的人生化”过程；抑或是其作对“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助成了作者日常“人生的审美化”。人生与艺术的契合竟是那么的天衣无缝！

对于他们而言，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急不徐、“前进而不激进”的生存姿态，标举一种智情合致的思维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不再奢谈古今治乱、国计民生的书生们，藉此得以以更其自我的眼光“面对大地和事实”，关注更其日常、宽广的人文经验，追求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形散神不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初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研究》（13BZW112）的阶段性成果]

- ①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②叶圣陶《悼匡互生先生》、周予同《火烧赵家楼》,收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匡互生与立达学园》第130、8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③郑欣森:《故宫的价值与地位》,《光明日报》2008年4月24日。
- ④见《“一师风潮”论衡》,《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 ⑤大白:《我想提倡的几种主义》(一),载1925年11月8日《黎明》周刊第6期。
- ⑥俞平伯:《打破中国神怪思想之一主张》,载1919年3月1日《新潮》第1卷第3期。
- ⑦鲁迅:《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⑧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第52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⑨⑩魏金枝:《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载1948年9月15日《文讯》第9卷第3期。
- ⑪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53至15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 ⑫冯雪峰:《悼朱自清先生》,《论文集》第1卷,第1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 ⑬柯灵:《叶圣陶同志的两封信》,收入《长相思》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 ⑭朱光潜:《缅怀丰子恺老友》,收入《艺文杂谈》第259页,安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⑮茅盾:《祝圣陶五十寿》,《华西晚报》1943年12月5日。
- ⑯谢冕:《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第4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 ⑰朱自清:《诗话》,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第25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 ⑱⑲⑳俞平伯:《读〈毁灭〉》,载1923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8期。
- ㉑㉒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 ㉓沈玄庐:《新旧文学一个大战场》,载1919年11月16日《星期评论》第24号。
- ㉔沈玄庐:《题画》,载1920年9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㉕《起劲》,载1920年4月11日《星期评论》第45号。
- ㉖参阅散木《参与过中共一大筹备的神秘女性丁宝林》,《党史博览》2011年第9期。
- ㉗曹聚仁:《补说汪诗人》,《我与我的世界》第238、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㉘朱自清:《〈蕙的风〉序》,汪静之:《蕙的风》,第413页,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 ㉙朱自清:《血歌——为五卅惨剧作》,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
- ㉚朱自清:《女人》,收入《背影》第11页,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
- ㉛朱自清:《湖上》,收入《踪迹》第38、39页,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下同)。
- ㉜㉝朱自清:《信三通》,收入《我们的七月》第196页,第197页,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 ㉞朱自清:《毁灭》,《踪迹》,第88页。
- ㉟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载1928年11月25日《文学周报》第7卷第20期。
- ㊱㊲自清:《哪里走》,载1928年3月5日《一般》第4卷第3期。
- ㊳参阅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㊴李广田:《谈散文》,收入《文艺书简》第42页,香港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 ㊵㊶㊷㊸范培松:《中国散文史》上卷,第230页,第204-205页,第242页,第38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 ㊹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㊺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第4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
- ㊻钱杏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第51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㊼㊽李广田:《〈朱自清选集〉序言》,《朱自清选集》,第8页,第10页,开明书店1951年版。
- ㊾㊿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8页,第18页,第17页,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 ㊿㊿圣陶:《朱佩弦先生》,载《中学生》1948年9月号,总第203期。
- ㊿㊿朱自清:《〈燕知草〉序》,俞平伯《燕知草》,第7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 ㊿㊿叶圣陶:《“双双的脚步”》,载1925年3月23日《文学》第165期。
- ㊿㊿丰子恺:《渐》,收入《缘缘堂随笔》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邢少涛